

## 梁啟超〈與蕙仙書〉書寫策略的操作

王惠鈴

東海大學中文系兼任助理教授

### 摘 要

1900 年梁啟超到檀香山宣傳保皇思想，與華僑之女何蕙珍發生婚外情，最後以分手作收。梁啟超當時寫了兩封家書給元配李蕙仙說明婚外情原委，照梁啟超〈與蕙仙書〉字面上的說法，他寫這封家書是要坦承面對自己精神上的出軌，告別這段婚外情，實踐一夫一妻制的理想，此說法為梁啟超贏得歷史好評。但從〈與蕙仙書〉字裡行間的小隙縫中，以及婚外情的後續發展來判斷，梁啟超〈與蕙仙書〉文字背後顯然隱藏其個人的權力與欲望。本文從「文學符號學」(Literature Semiology)的角度切入，將梁啟超〈與蕙仙書〉視為一個經過編碼的符號(sign)，試圖進行符號解碼的工作，將此一符號的「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區分開來，「能指」方面，梁啟超〈與蕙仙書〉持續為維新運動的理想做服務，替「一夫一妻制」建立典範，「所指」方面，其消極意義是補償婚姻生活中的精神損失，做為自我救贖之道，其積極意義則希望促成李蕙仙知難而退，梁啟超得以與何蕙珍長相廝守。梁啟超〈與蕙仙書〉的符號學意義則在於把身為知識男性(the sit of masculine literary pleasure and exchange)的「扮相」(performativity)完美詮釋。

**關鍵辭：**梁啟超、〈與蕙仙書〉、書寫策略、符號學、扮相

---

\* 本文於 2008.03.20.收稿，05.21.外審通過刊登。

## 前 言

梁啟超(1873-1929)是中國近代知名的知識分子，生於清同治 12 年（農曆 1 月 16 日，國曆 2 月 23 日），卒於民國 18 年（農曆 1 月 19 日，國曆 2 月 28 日），得年 57 歲。曾就讀於廣州知名學府「學海堂」、康有為主持的「萬木草堂」，最高學歷是清光緒 15 年(1889)17 歲時廣東鄉試舉人第 8 名，光緒 21 年(1895)參與「公車上書」事件，光緒 22 年(1896)擔任上海《時務報》（旬刊）主筆，發表〈變法通議〉諸文，主張全面性的變法維新，建立高知名度。光緒 24 年(1898)9 月「戊戌政變」後，直到民國建立前夕(1911)為止，梁啟超流亡海外長達 14 年。民國 2 年(1913)擔任袁世凱內閣的司法總長，民國 6 年(1917)擔任段祺瑞內閣的財政總長，皆遭受當時知識分子的議論。民國 9 年(1920)後淡出政壇，開始著述講學，先後任教於北京大學、南開大學、東南大學、清華大學。

歷史上對梁啟超的評價褒貶互見，爭議性較大的是梁啟超於維新派與革命派的分合與論戰恩怨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民國初期出任袁世凱與段祺瑞內閣引起討論，還有梁啟超與恩師康有為在民國 6 年 7 月「丁巳復辟」事件後，師徒兩人分道揚鑣也頗有話題性，但受到肯定的是在中國文學史上，梁啟超於晚清時期推動「新民叢報體」、「詩界革命」、「小說界革命」等主張，被視為民初五四運動中的「白話文運動」的先行者，最後以「思想導師」、「文化宗師」的地位蓋棺論定。

梁啟超是廣東省新會縣茶坑村出生的鄉下小孩，排行老大，祖父梁延后（字維清）和父親梁祥徽（字寶瑛）皆靠教書維生，過著半耕半讀的生活，屬於中下等級的鄉紳階層。梁啟超中學後於光緒 17 年(1891)19 歲時與當時 23 歲的李蕙仙結婚，李蕙仙（出生於河北）比梁啟超年長 4 歲，是清朝禮部尚書李端棻的堂妹，京兆尹李朝儀的女兒，由於李端棻十分賞識梁啟超的才華，便作主將堂妹李蕙仙許配給他，梁家因為高攀李家的關係，梁李在北京完婚，婚後也常住在北京李端棻家中，李端棻非常器重梁啟超，獎掖提拔不遺餘力，直到戊戌政變發生<sup>1</sup>。

---

<sup>1</sup> 李家祖籍湖南衡州清泉縣，落籍貴州貴陽，為仕宦望族，因為擔任京師要職，長年居住北京。李端棻（字必園）年幼喪父，賴叔父李朝儀撫養栽培，李朝儀為二品京兆尹，有一女李端蕙（蕙仙），堂兄妹二人親如胞兄妹。1881 年李朝儀病逝，1889 年 57 歲的李端棻典試廣東，賞識 17 歲的梁啟超，

梁啟超特別注重女子教育，其〈變法通議〉有〈論女學〉一文、《時務報》有〈倡設女學堂啓〉一文、《新民叢報》有〈禁早婚議〉一文，皆基於「強國強種」的觀點，主張女子自主解放，成立「一夫一妻世界會」、「不纏足會」、「上海女子學堂」。梁啟超讓李蕙仙擔任「上海女子學堂」校長，鼓勵她解放纏足，李教導梁說官話（北京話），梁稱李蕙仙為「閨中良友」。元配李蕙仙生了 2 女 1 男，光緒 30 年(1904)32 歲的梁啟超納妾王桂荃(1886-1968)，並育有 4 男 2 女，梁啟超總計有兩名夫人，9 名子女（4 女 5 男）<sup>2</sup>。

梁啟超處於新舊時代過渡時期，傳統漢學為根基，又接受西方思潮的啟蒙，思想上主張改革，但行為上難以完全擺脫舊觀念的包袱。〈論女學〉重視女子教育，並非著眼於女性個體生命的獨立性，「強國強種」觀念仍將女性附屬於男性來思考，〈禁早婚議〉主張男性 30 歲（女性 20 歲）適婚，其他像一夫一妻制、解放纏足等主張，梁啟超自己實際上也未做到，他鼓勵李蕙仙放足，李蕙仙也遲遲沒實行。

「戊戌政變」後，梁啟超流亡日本，光緒 25 年(1899)年底到檀香山宣傳保皇思想，至 1900 年國曆 6 月 30 日為止，皆停留在檀香山，約半年時間。當時 28 歲的梁啟超與 20 歲的華僑之女何蕙珍發生婚外情，最後以分手作收，當時元配李蕙仙 32 歲，只生育一女梁思順，婚外情落幕後不到 4 年的時間，梁啟超便低調納妾，何蕙珍則終身未嫁。

梁啟超於 1900 年國曆 5 月 24 日寫第一封信給李蕙仙說明婚外情發生經過，6 月 12 日李蕙仙回信，但此封信只知部分內容，6 月 30 日梁又再寫第二封信給李蕙仙解釋自己內心的想法，所以本文所討論的主要對象〈與蕙仙書〉包括前後兩封信。關於這段婚外情，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說：

先生居檀香山時，有華僑女子何蕙珍者，學問志氣，均逾尋常，因慕先生才名，欲婚先生，先生也頗戀戀。但是卒以環境未許，未能好合，當時先

故李端棻便作主促成梁啟超和李蕙仙的婚事。李端棻膝下無子（有一名過繼子李葆忠），與梁啟超情同父子，李在政治上屬於前「清流派」成員，「松筠十君子」之一，後成為「帝黨集團」的重要成員之一，在「百日維新」中擔任「禮部尚書」一職，官至二品，梁啟超、康有為、譚嗣同、黃遵憲、唐才常、徐勤、夏曾佑……等 20 位維新派人士，皆直接或間接經由李端棻舉薦給光緒皇帝，得到重用。1898 年「戊戌政變」發生時，李端棻將家中所藏兩百兩銀子贈與梁啟超以資逃亡，李則流放新疆，1907 年病逝貴陽。

<sup>2</sup> 梁啟超的九個兒女排行：思順（女）、思成、思永(1904)、思忠、思莊（女）、思達、思懿（女）、思寧（女）、思禮。除了思順(1895)、思成(1901)、思莊三人為李蕙仙所生外，其他皆王桂荃所生。

生給他夫人一封很長的信，述說這件事，我們以為這也是先生平生裡一件很重要的事，故錄之以見經過情形和先生當日的抱負。<sup>3</sup>

可見，此段婚外情對梁啟超與李蕙仙的婚姻有著重要意義，才會在前後兩封家書中詳細說明。梁啟超離開檀香山三個月後，1900年10月1日《清議報》「詩文辭隨錄」專欄，梁啟超將婚外情寫成〈紀事〉24首絕句詩，公開發表，被康有為怒斥「荒淫無道」，更可見梁啟超對此段情感難以忘懷之迹。

李威熊編《大學國文精選》的「古典抒情文」單元選錄1900年5月20日梁啟超〈與蕙仙書〉一文，嚴格說來是第一封信的大部份內容，並評論說：

對於這樣的一段情緣，梁啟超原本可以不必如此坦率，向遠在中國的妻子表白，以免不必要的困擾。但基於夫妻的互信互愛，梁啟超還是寄出了這一封信。……《中庸》說：「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姑不論梁啟超的妻子，看了這封信反應如何，至少，梁啟超在這封信中，誠於自己的感情，誠於知己蕙珍，尤誠於妻子蕙仙，已足以令人折服。<sup>4</sup>

梁啟超願意跟妻子李蕙仙詳細說明婚外情的經過，確實勇氣可嘉，更難得的是，他可以在信中向妻子坦承真的愛上何蕙珍，也真的盡量安慰妻子的情緒，希望把對妻子的傷害降到最低，實在用心良苦。

實際上，對於梁啟超婚外情的始末，後人皆根據梁啟超〈與蕙仙書〉所說的版本做出高度的評價，梁啟超是該事件的當事人，其版本當然有最高的參考價值，但是正因為梁啟超是當事人，在他向妻子說明婚外情的原委與心境時，是否可能因為維護自己或保護第三者的關係，採取避重就輕、選擇性的說明部份情節呢？而不是將完整的發生經過一五一十地和盤托出呢？梁啟超寫〈與蕙仙書〉表面上看來除了對妻子表示忠誠之意和補救之計外，有沒有可能暗藏其他不敢明說的意圖呢？譬如梁與李蕙仙沒有真愛基礎而結婚，但畢竟李蕙仙恪遵婦德，患難與共，又礙於梁曾提出「一夫一妻制」的理想，導致梁根本無法

<sup>3</sup> 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臺北：世界書局，1962），頁134-135。本文關於〈與蕙仙書〉的引文，皆出自於此，以下簡稱《梁譜》。

<sup>4</sup> 李威熊編，《大學國文精選》（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7），頁144。

向李提離婚，梁是否想藉由〈與蕙仙書〉試探李蕙仙會不會知難而退，並展現成人之美，主動成全梁何佳偶呢？透過書寫策略的運籌帷幄，若真的達成離婚協議，梁啟超的書寫策略便成功奏效，與何蕙珍雙雙攜手同遊美洲；萬一沒有造成離婚的效果，反正〈與蕙仙書〉白紙黑字也沒有挑明說要離婚，梁至少還可以全身而退，並留下一段「發乎情，止乎禮義」的佳話，對梁來說不至於有壞結果。文字是後人解讀歷史重要的憑據之一，後人想要了解一段歷史真相，能完全信任文字而不加思辯嗎？同時，文字也是表達思想情感的工具之一，經過書寫、潤飾、加工過程的文字，其背後所隱藏的真正欲望和權力，有沒有可能真相大白？此為本文立論的問題意識所在。

## 一、本文的立論

承續「前言」的問題意識下來，加上從〈與蕙仙書〉字裡行間的小隙縫中，以及婚外情的後續發展來判斷，本文很可以從「文學符號學」的角度來切入。討論前必須先了解梁啟超在 1900 年〈與蕙仙書〉之前，有否出現過類似的寫作手法？說明梁啟超 1900 年〈與蕙仙書〉的寫作手法有可能是不單純的。以光緒 23 年(1897)〈記江西康女士〉一文為例。

### （一）1897 年梁啟超〈記江西康女士〉的寫作手法

光緒 23 年(1897)3 月 23 日梁啟超主筆《時務報》，刊出一篇 800 餘字的女醫師小傳，即為〈記江西康女士〉。據梁啟超文中所述，主角康愛德女士剛取得美國密西根大學醫學士學位歸國行醫，發心將所學貢獻於中國，拯救中國長期以來的積弱不振，為女性同胞樹立一個「新女性」的典範。

這樣一篇激勵人心的文章，放在晚清力圖變法改革的時代氛圍下，對文章字面進行解讀並沒有矛盾之處。但根據胡纓〈歷史書寫與新女性形象的初立：從梁啟超〈記江西康女士〉一文談起〉研究顯示，卻得到以下幾點看法：

1. 美國新澤西「美以美教會」歷史檔案館、密爾斯根大學和西北大學都有「Ida Kahn」名下的檔案，康女士這裡的形象與梁啟超所勾勒的頗不相同，如她並非幼孤，也沒有從 9 歲起在美國上學，更重要的是，〈記江西康女士〉

中對教會在康女士一生中的影響隻字不提，是一個明顯的空白。……因此可以推測，梁啟超之所以閉口不談康女士的教會背景，也許正是因為不願意把這樣一個新女子典範的成就歸美於基督教。這樣一來，典範固然純潔化了，「現代」的意義也純潔化了，但代價則是歷史被掩埋被扭曲了。

2. 梁啟超的〈記江西康女士〉，勾畫了一個「以中國之積弱引為深恥，自發大心，為二萬萬人請命」的新式女性康愛德，使她成為古代才女的對立面，成為歷史發展的化身，中國前途的希望。……以這兩大語系為框架，關於康女士個人的故事的不同版本就必然對歷史有選擇有拋棄有掩埋，甚至可以說任何一個版本的故事之所以講得圓，就是因為康女士一生中某些成分已經被遺忘了。
3. 康女士這一個案因此印證了一個歷史的悖論：雖然「新女界」、「新女杰」這類詞彙在晚清文章中屢見不鮮，似乎被賦予很重要的涵意，但是這類詞彙的歷史可釋性是建築在對真正生活中女子的遺忘的，具體說，「新女子」的前身「才女」從此被貶為「舊式女子」，而「新女杰」本身任何不夠「現代」的因素也被掩埋被遺忘。<sup>5</sup>

以上三點說明了一件事情，梁啟超寫〈記江西康女士〉一文並沒有老老實實把真正康女士的形象完整寫出來，而是選擇性的寫康女士，並試圖讓此一典範替梁啟超的某種意識形態做代言。

光緒 23 年梁啟超寫〈記江西康女士〉一文時，「戊戌維新」還在醞釀之中，女子教育是整個變法運動的重要支柱之一，但還在雛型階段，女子出國學西醫更是鳳毛麟角，晚清中國的傳統女性觀需要改造，才能有效推行變法維新，但沒有具體成功的案例可當指標，直到康愛德學成歸國，行醫救人，梁啟超找到了具說服力的成功案例，便將康愛德設定成新中國「新女性」的典範來進行書寫，設法把康愛德寫成在中國境內是古代才女的對立面，在國際舞臺上成為新中國的代言人，儘管是個裝扮成舊式士大夫的女子也說得通。

而康愛德的真實人生中，凡是跟維新運動需要的「新女性」形象扯不上關係的事件，例如康愛德的養母吳格矩（美國傳教士）在中國傳教 20 多年、基

---

<sup>5</sup> 胡纓，〈歷史書寫與新女性形象的初立：從梁啟超〈記江西康女士〉一文談起〉，《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第 9 期，2001.08.，頁 15-16、27-28、29。

督教提供康愛德的信仰基礎……等，儘管對康愛德是重要部份，因為不符合梁啟超的意識型態，便自動地被梁啟超省略不提，甚至是張冠李戴的詮釋。晚清維新人士與教會之間的相處狀況很複雜，彼此有不同的考量，產生不少矛盾心理，戊戌變法前期，梁啟超逐漸拋棄傳教士所謂「西學起於西教」之說，所以康愛德的成就自然要與她的基督教背景做切割，這樣一來，梁啟超〈記江西康女士〉中的康愛德才能符合中國需要的「新女性」典範。

梁啟超〈記江西康女士〉雖然是歷史書寫，但不是謹守客觀原則的歷史書寫，說起來應該要算是梁啟超為了服務自己的意識形態所做的改寫，可以歸入文學寫作的範疇，由於該文公開發表於閱讀率很高的《時務報》上，該文便很有可能成為具有「符號學」意義的範作。可見，梁啟超在 1900 年寫〈與蕙仙書〉之前，就曾經出現過類似「符號學」意義的寫法。

## （二）「文學符號學」討論本文的可能

### 1. 「文學符號學」的理論

「文學符號學」將文學作品視為「符號」(sign)系統，文學作品的作者透過有意識或無意識的心理狀態，對此「符號」進行編碼處理，而「符號」是用「能指」(signifier)指明「所指」(signified)，「所指」才是編碼過程的目標，所以「能指」是手段，「所指」才是目的。(美)羅伯特·司格勒斯《符號學與文學》說：

文學本文的創造者，自身就是文化的創造物，它通過語言獲得了人的主體。他們作為文學本文所創造的東西，是通過承認一般的或推理的原則的約束而取得的。通過他們，許多聲音也在講話——某些文化的或公眾的聲音；某些聲音，則是由於壓抑個人需要的某些方面而被扭曲後出現的，作為在語言中獲取公眾的主體性的代價。一個作者並不是一個完美的自我，而是一個公眾的和個人的、意識的和無意識的的因素的混合物，用作解釋的基礎，是不充分不完整的。<sup>6</sup>

<sup>6</sup> (美)羅伯特·司格勒斯(Robert Scholes)著，譚大立、龔見明譯，《符號學與文學》(SEMIOTICS AND INTERPRETATION) (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88)，頁 20-21。

此段話說明將文學作品視為一種「符號」意義的理由，所以文學作品「必須在符號學的各種過程中——在它們產生和傳達意義的能力中——這是人存在的一個不可或缺的方面，以內在的愉悅為基礎。為了產生文學的本文，把另外的編碼形式強加在語言上，在語言中造成了一個有力的表演或遊戲的因素——許多人類文化的變異就是這樣產生的」<sup>7</sup>。作品的作者在敘述一件事情時，由於「敘述性包括解釋建構的許多程序，但我們可以挑選出其中的一個程序做為這一活動最獨特的特性。……當我們專心於一個敘述時，我們最大的努力就是要建構出一個令人滿意的事件順序」<sup>8</sup>。也就是作者會有意識的將「符號」加以編碼，以符合情理的基礎，儘管它在某個程度上可能與真相不完全符合。

解讀文學作品時，讀者「在面對文學藝術本文或消遣娛樂本文時的活動，既包括把符號的各種慣例被動地或自動地譯成可以理解的因素這一活動，也包括把本文符號積極地或解釋性地重新安排成一個意義結構這一活動。這些活動自動的那一部份，屬於語言或符號能力的事，因此這時不是我們特別感興趣的所在；而解釋部份卻與我們有關」<sup>9</sup>。意思是說，讀者最直接的解讀方式傾向於符號「能指」的層面，也就是說讀者往往滿足於字面意義上的解讀，對於符號「所指」的層面較不敏感，但符號的「所指」在理論上才是該符號的核心意義，必須有賴研究者或評論家去梳理。相同的說法，周慶華《中國符號學》也提到：

「事實式的」書寫型態表面上是純粹的指陳、述說現象，實際上卻暗含書寫者想藉書寫導至行動、踐履的動機和立場。…不論如何，它們顯現了書寫在「敘述」、「規範」和「評價」等功能類型上分立的情況，而它們背後所隱含的權力欲求，又使得它們成了為達支配他人的目的而設的三種手段。<sup>10</sup>

因此，從「文學符號學」的角度來解讀文學作品，往往可以直達該作品的深層意義，將文字背後隱藏的欲望和權力找出來。

---

<sup>7</sup> 同前註，頁 53。

<sup>8</sup> 同前註，頁 97。

<sup>9</sup> 同前註，頁 96。

<sup>10</sup> 周慶華，《中國符號學》（臺北，揚智文化事業公司，2000），頁 48。



## 2. 梁啟超〈與蕙仙書〉與「文學符號學」的關連性

梁啟超〈與蕙仙書〉跟「文學符號學」能扯上什麼關係？若按照梁啟超〈與蕙仙書〉字面上的說法，他寫這封家書是要坦承面對自己精神上的出軌，告別這段婚外情，實踐「一夫一妻制」的理想。但是梁啟超離開檀香山三個月後，1900年10月1日《清議報》「詩文辭隨錄」專欄，自行將婚外情寫成〈紀事〉24首絕句詩，公開發表，可見他尚未真正調整好感情狀態。另外，婚外情檯面上落幕後不到4年的時間，梁啟超便低調納妾，也沒有真的遵守「一夫一妻制」。從這些後續發展來看，可以發現梁啟超的行為與〈與蕙仙書〉中的說法是背道而馳的，因此〈與蕙仙書〉的寫作動機應該不單純，其解讀方式不能僅止於字面上，必須更深入去挖掘書寫背後梁啟超的權力慾望。

其次，梁啟超〈與蕙仙書〉是家書，讀者應該只有妻子李蕙仙一人，梁啟超有必要大費周章經營此一「符號」嗎？有必要，因為「專業作家沒有下班的時候」<sup>11</sup>。特別是知名度高的公眾人物，註定難以享有真正的隱私權。江勇振〈男性與自我的扮相：胡適的愛情、軀體與隱私觀〉從胡適寫日記的心態做觀察，發現胡適的日記並非屬於祕而不宣的性質，它更是他「知識男性唱和的園地」(the sit of masculine literary pleasure and exchange)裡一個重要的環節。簡言之，胡適的日記實際上是他的來往書信和學術著作的延伸。換句話說，我們不可能從胡適日記中認識百分之百的胡適，因為他會刻意保留某些不想被看到的自己，但可以從日記中認識百分之百的胡適「扮相」(performativity)<sup>12</sup>，因為他會刻意突顯某些想被看到的自己。

而梁啟超〈與蕙仙書〉所言之事的完整面貌是否無從得知了？也不盡然，

<sup>11</sup> 琳·卜倫(Lynn Bloom)〈I Write for Myself and Strangers': Private Diaries as Public Documents〉說：「專業的作家所寫的東西，沒有一件真正是屬於私人性質的。專業作家沒有下班的時候。」另外，威廉·蓋司(William Gass)〈The Art of Self〉也說：「如果我已經顧慮歷史會怎麼寫我；如果我知道在我走了以後，我所留下來的塗鴉會讓人家審視、讚嘆、品評，我可能就會開始埋下一些能幫我開罪的伏筆、重新排比片段、把故事稍為改編一下、報一點小仇、改寫、讓自己看起來像樣一點。」引自江勇振，〈男性與自我的扮相：胡適的愛情、軀體與隱私觀〉；收於熊秉真主編，《欲掩彌彰：中國歷史文化中的「私」與「情」——公義篇》(臺北：漢學研究中心，2003)，頁199-200。

<sup>12</sup> 茱蒂絲·巴特勒(Judith Butler)〈Gender Trouble〉說：「扮相」(performativity)是一而再、再而三，反覆地扮演，是社會上約定俗成的意義符號的重演和再體驗。……胡適在自敘、自傳方面的所作所為，是承襲了中國文人傳統裡的「知識男性的自我觀」(masculine literary subjectivity)。他在自傳的書寫和保存方面所下的工夫，就像歷史上男性所獨佔的學術圈一樣，等於是他在「知識男性唱和的園地」(the sit of masculine literary pleasure and exchange)裡的耕耘。在他的一生當中，除了兩位女性——陳衡哲和韋蓮司——可以在思想上與胡適平起平坐的身分，躋身進入他唱和的園地以外，他的自傳園地，基本上是一個男性的世界。以上見江勇振，〈男性與自我的扮相：胡適的愛情、軀體與隱私觀〉，《欲掩彌彰：中國歷史文化中的「私」與「情」——公義篇》(同前註)，頁197-198。

Michel de Certeau《*The Writing of History*》認為被遺忘的歷史並不會消失得無影無蹤，因為「任何一個對過去的詮釋都必然製造出一些所謂無關緊要的東西，比如選材時棄而不用的東西，解釋不清楚的扔在一邊的東西，這些所謂無關緊要的東西遲早都會跑回來，躲在話語的縫隙裡死角裡：以『抵抗』、『題外話』、『延緩』等形式悄悄地擾亂著『歷史發展』的漂亮的筆直行程，悄悄地擾亂著我們採用的解釋系統」<sup>13</sup>，當初被書寫者以為不重要而捨棄不寫的歷史，會在適當的時機出現，動搖研究者對歷史定論的信念。另外，透過上述「文學符號學」提供「能指」與「所指」的觀念，對作品本身進行解碼，歷史真相仍可能浮出。

梁啟超〈與蕙仙書〉用「符號」概念來思考的話，裡面的每一段話應該都經過編碼程序，其具備表面意義的「能指」，其背後也具有深層意義的「所指」。梁啟超為了兼顧「能指」和「所指」的意涵，必須將這些「符碼」操作好排列好，以達到符合社會的期待和內心的愉悅。所以梁啟超〈與蕙仙書〉字面上的意義不完全是文字背後真正的意義，很可以用「文學符號學」的角度來立論。

## 二、梁啟超〈與蕙仙書〉的「符號」解碼

梁啟超於 1900 年國曆 5 月 24 日寫第一封信給李蕙仙說明婚外情發生經過，6 月 12 日李蕙仙回信，但此封信只知部分內容，6 月 30 日梁又再寫第二封信給李蕙仙解釋自己內心的想法，並安慰妻子李蕙仙的情緒。信中梁啟超坦承真的愛上何蕙珍，但因為環境不許可，只好分手，以兄妹相稱，梁對婚外情做了一個結論，說自己是「發乎情，止乎禮義」。經過反覆閱讀發現，梁啟超使用了幾個基本論調，為達成特定目的，進行書寫策略的鋪排，來詮釋婚外情的始末，讓婚外情發生的合情合理，分手分得悲情淒美，設法避免一場家庭風暴。為了模擬梁啟超〈與蕙仙書〉書寫時可能產生的心理狀態，本節論述時會出現「我梁啟超」、「妻子你」等口白用語。

### （一）婚外情由何蕙珍主動，我梁啟超是被動的

#### 1. 何蕙珍與梁啟超初見面時，便向梁啟超預訂來生之約

<sup>13</sup> 引自胡纓，〈歷史書寫與新女性形象的初立：從梁啟超〈記江西康女士〉一文談起〉，《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 9 期，頁 15-16、27-28、頁 28。

梁啟超〈與蕙仙書〉說到與何蕙珍第一次見面時，何蕙珍就向梁啟超熱情表白愛慕之意，並明確地向梁預約來生：

及臨行，（何蕙珍）與余握手而言曰：「我萬分敬愛梁先生，雖然，可惜僅愛而已，今生或不能相遇，願期諸來生，但得先生賜以小像，即遂心願。」余是時唯唯而已，不知所對。<sup>14</sup>

面對何蕙珍大膽示愛，梁啟超可說是始料未及，無力回應，突顯何蕙珍「女追男」的主動形象。

## 2. 何蕙珍託人向梁啟超提親

預約來生事件發生半個月後，便有朋友上門來向梁啟超求親，詢問梁是否有意娶何蕙珍，梁啟超以堂堂正正的四大理由回絕<sup>15</sup>，一是我梁啟超曾創辦「一夫一妻世界會」，自己已是有婦之夫，不可背義，二是我有政治犯的通緝令在身，流亡海外，自身已難保，不應牽連他人，三是我的事業心很重，滿腹理想抱負，當我的妻子都會獨守空閨，不該再製造另一位深宮怨婦，第四我是全球知名的公眾人物，不可亂搞男女關係，傷害形象，必須愛惜羽毛。種種考慮之下，梁啟超只好忍痛割愛：

「請君為我謝彼女郎，我必以彼敬愛我之心敬愛彼，時時不忘，如是而已。」友人未對……友人遽曰：「先生既知彼人，某亦不必吞吐其詞，彼人目中豈有一男子足當其一盼？彼於數年前已誓不嫁矣。請先生勿再他言。」遂辭去。<sup>16</sup>

突顯梁啟超重視家庭價值，因公忘私，顧全大局，有情有義，在婚外情中處於被動回應的一面。

從以上兩段引文看來，梁啟超跟妻子李蕙仙述說婚外情的發生經過時，強

<sup>14</sup> 《梁譜》，頁 135。

<sup>15</sup> 原文是「吾嘗與同志創立一夫一妻世界會，今義不可背，且余今日萬里亡人，頭顱聲價，至值十萬，以一身往來險地，隨時可死，今有一荆妻，尚且會少離多，不能廝守，何可更累人家好女子。況余今日為國事奔走天下，一言一動，皆為萬國人所觀瞻，今有此事，旁人豈能諒我？」見《梁譜》，頁 135。

<sup>16</sup> 同前註。

調一開始是何蕙珍主動表白，後來也是何蕙珍主動求親，我梁啓超完全是被動的，甚至是不爲所動的。由於何蕙珍比較主動的關係，我梁啓超也一步一步的受到影響，慢慢的對她動心了起來，愛意從無到有的發生經過如下：(1)梁對何的第一印象是不怎麼樣，「余初見蕙珍，見其粗頭亂服如村姑，心忽略之」。(2)接著是驚豔，「及其入座傳語，乃大驚，其目光炯炯，絕一好女子也」。(3)再來是加溫，「雖近年以來，風雲氣多，兒女情少，然見其事，聞其言，覺得心中時時刻刻有此人，不知何故也。」(4)最後梁啓超是在掙扎的情況中愛上何蕙珍，「余歸寓後，愈益思念蕙珍，由敬重之心，生出愛戀之念來，幾於不能自持。明知待人家閨秀，不應起如是念頭，然不能制也。酒闌人散，終夕不能成寐，心頭小鹿，忽上忽落，自顧生平二十八年，未有如此可笑之事者」<sup>17</sup>。愛情真的來了，梁啓超活了 28 年以來，從來沒遇見過愛情，並曾經試著用理智克制自己不要動心，可是沒有用，愛情面前，人變得焦慮，控制不住自己，我被動的、情非得已的愛上何蕙珍。

## （二）何蕙珍對我梁啓超的幫助更大於妻子，我愛上何蕙珍合情合理

### 1. 何蕙珍英文能力強

梁啓超在信中向妻子李蕙仙如何描寫何蕙珍的形象及條件呢？首先，何蕙珍可算是我梁啓超在政治事業上的救命恩人：

初時有一西報為領事所囑，誣謗余特甚，有人屢作西文報紙與之駁難，而不著其名，余遍詢同志，皆不知。即是夕，蕙珍攜其原稿示我，乃知皆蕙珍所作也。余益感服之。<sup>18</sup>

當不會英文的梁啓超在檀香山遭受政敵用英文文章進行圍剿時，全賴精通英文的何蕙珍幫他脫困，使梁啓超的政治形象不致受到太大傷害，並且具有反擊能力，這要歸功何蕙珍的英文才華和她對梁啓超的一片忠誠。所以，梁啓超跟妻子李蕙仙這樣說：

---

<sup>17</sup> 《梁譜》，頁 136。

<sup>18</sup> 《梁譜》，頁 135。

吾因蕙仙得諳習官話，遂以馳騁於全國；若更因蕙珍得諳習英語，將來馳騁於地球，豈非絕好之事。<sup>19</sup>

何蕙珍的英文實力不只是女中翹楚，還比男人出色，「蕙珍年二十，通西文，尤善操西語，全檀埠男子無能及之者」。當時的中國女性，要找到像何蕙珍這樣優秀的外語能力的，應屬相對少數，但要找到會說流利官話的中國女性，應該相對多數，因此，妻子你只能給我全中國，但何蕙珍可以給我全世界，相較之下，妻子略遜於何蕙珍。

## 2. 何蕙珍不纏小腳

除了英文能力的比較外，何蕙珍比妻子更走在時代先端，更符合我理想中的「新女性」形象，也是可以與我一起實現理想和抱負的事業夥伴。其一，纏小腳是封建陋習，女人應該要覺醒，不要再纏小腳，才能「強國強種」，李蕙仙卻遲遲不肯放足：

卿（李蕙仙）已放纏足否？宜速為之，勿令人笑維新黨首領之夫人尚有此惡習也。此間人多放者，初時雖覺痛苦，半月後平復矣。不然，他日蕙珍妹子或有相見之時，亦當笑殺阿姊也。<sup>20</sup>

梁啟超向來反對纏足，鼓勵妻子放足，只是妻子不聽，梁啟超也沒辦法，這次剛好出現第三者介入我倆的婚姻，便借用何蕙珍「新女性」的形象，刺激妻子覺醒，應該比梁啟超勸說一百遍還有效。

## 3. 何蕙珍與我有共通話題

何蕙珍雖是女性，但對教育很有理想抱負，同時還跟我們男人有共通話題，非常聊得開，例如何蕙珍「學問見識皆甚好，喜談國事，有丈夫氣」，又如：

（何蕙珍）但言中國女學不興為第一病源，並言當如何整頓小學校之法以教練兒童，又言欲造切音新字，自稱欲以此兩事自任而已。……「現時為

<sup>19</sup> 《梁譜》，頁 136。

<sup>20</sup> 《梁譜》，頁 137。

小學校教習，非我（何蕙珍）之志也。我將積數年束脩所入，持往美洲就學於大學堂，學成歸國辦事。先生他日維新成功後，莫忘我，但有創辦女學堂之事，以一電召我，我必來。」<sup>21</sup>

何蕙珍的女學理念與梁啟超的女學主張是相類似的<sup>22</sup>，於是產生共通話題，常常聊到無法自拔，「其言滔滔汨汨，長篇大段，使幾窮於應答。余觀其神色，殆自忘為女子也。我亦幾忘其為女子也」。並且在引文中，何蕙珍表示自己還想進修，為梁啟超的維新事業和中國女學做出最大貢獻，成為梁啟超的合作夥伴。

梁啟超對何蕙珍真正動心後，雖然兩人以兄妹關係作收，也刻意避不見面，但梁啟超對何蕙珍的能力才華產生強烈的依賴感，梁啟超說「每接見西人，翻譯者或不能達意，則深自憤恨，輒憶此人（何蕙珍）不置耳」。相較於梁啟超對妻子所說「吾雖忙殺，然知卿（李蕙仙）閑殺悶殺，故於極忙之中，常不惜偷半夕之閑，寫數紙與卿對語。」言下之意，梁啟超的意思是何蕙珍雖得不到我的人，但得到了我的心；而李蕙仙雖然留住我的人，但我只好儘可能的維持夫妻情誼。面對各方面條件都比妻子優秀的何蕙珍，我梁啟超愛上她是正常而合理的，因為「任公血性男子，豈真太上忘情者哉。其於蕙珍，亦發乎情，止乎禮義而已」。我是男人，不是聖人或神仙，我有愛人的能力，本屬天經地義，只要沒有逾越禮教防線，不能說我有罪。

### （三）我梁啟超是「公領域」的人物，事情鬧大對誰都沒好處

梁啟超非常看重自己，認為自己的影響力很大，他強調「梁啟超」不只是李蕙仙的丈夫而已，更是維新派的領袖人物，也是救亡圖存的靈魂人物，我的好壞關係著國家前途的安危，身為這樣一位公眾人物，維護梁啟超就等於保護家國一樣重要。相對的，我梁啟超也不會只憑一己喜惡行事，必須顧慮到整體最大利益，不得已的情況下，我會做出犧牲，放棄擁有真愛，避免輿論的紛擾，維持眾人對我寄予的厚望：

<sup>21</sup> 《梁譜》，頁 136。

<sup>22</sup> 1896 年梁啟超〈變法通議〉「論女學」說：「治天下之大本二，曰正人心，廣人才，而二者之本，必自蒙養始，蒙養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婦學始，故婦學實天下存亡強弱之大原也。……教男子居其半，教婦人居其半，而男子之半，其導原亦出於婦人，故婦學為保種之權輿也。」李又寧、張玉法編，《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臺北：傳記文學社，1975），頁 552。

余今日為國事奔走天下，一言一動，皆為萬國人所觀瞻，今有此事，旁人豈能諒我？……吾之此身，為眾人所仰望，一舉一動，報章登之，街巷傳之，今日所為何來？君父在憂危，家國在患難，今為公事遊歷，而無端牽涉兒女之事，天下之人豈能諒我？我雖不自顧，豈能不顧新黨全邦之聲名耶？<sup>23</sup>

尤其 1900 年 6 月中國因為義和團事件，已經引發八國聯軍攻打中國，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被迫出走，京師淪陷，有可能亡國，「拳匪陷京津，各國干涉，亡國在即，吾黨在南，不識能乘時否？嗟夫！嗟夫！吾獨何心，尚喁喁作兒語耶」。我不能陷在婚外情風波中，因為國家此刻正需要我。所以事情不能鬧大，影響維新黨的救國大業，若李蕙仙無法體認到這一點，還要掀起家庭風暴，就會耽誤救國大業，成為千古罪人。這樣一來，李蕙仙不管多麼強勢或委屈，也應該不會在這節骨眼上跟梁啟超算婚外情的帳。

歸納來說，在這裡梁啟超使用了一個很樸素的辯證法，如下：

∴梁啟超=維新黨代表；維新黨=救中國的希望

∴梁啟超=救中國的希望

（目的只要是救國的，其權限都可無限上綱）

維護梁啟超的形象=保護中國的形象

傷害梁啟超的形象=破壞中國的形象

這樣簡單的辯證法在邏輯上沒有很大的錯誤，但實際上難以服人，因為涉及到「公領域」與「私領域」議題時，一向很難套用理論，因為這是個只有立場沒有對錯的問題，而梁啟超心裡應該知道中國人向來是將「公領域」看得比「私領域」重要，他之所以這樣操作公、私領域議題的辯證，無非是想把婚外情的風波盡快壓下來，並進一步節制李蕙仙的反彈情緒，讓局面得以掌控。

#### （四）妻子收信後的情緒反應，應該受我梁啟超的節制

##### 1. 李蕙仙應該和我一樣敬愛何蕙珍

<sup>23</sup> 《梁譜》，頁 136-137。

李蕙仙回信的內容今日無法看到完整版，只有部分片段，此點後文將有論述。而梁啓超〈與蕙仙書〉一邊握著說明婚外情原委的發聲權，一邊試著規範妻子看完信後的情緒反應的節制權，第一封信中就已經展現此種企圖：

不知蕙仙聞此將笑我乎？抑惱我乎？吾意蕙仙不笑我，不惱我，亦將以我敬愛蕙珍之心而敬愛之也。……蕙珍贈我兩扇，言其手自織者，物雖微而情可感，余已用之數日，不欲浪用之。今以寄歸，請卿為我什襲藏之。卿亦視為新得一妹子之紀念物，何如？……而我蕙仙之與我，雖復中經憂患，會少離多，然而美滿姻緣，百年恩愛，以視蕙珍之言，今生不能相遇，願期諸來生者，何如？豈不過之遠甚！卿念及此，惟當自慰，勿有一分抑鬱愁思可也。<sup>24</sup>

梁啓超要妻子不能責怪他，還要像他一樣欣賞何蕙珍，並將何蕙珍送的定情物好好保管，不可以生悶氣，這樣才符合我的期待，才不會又被落落大方的何蕙珍比下去，因為何蕙珍什麼都沒得到，名譽還可能因此受損，終身嫁不掉，卻可以「毫無愛戀抑鬱之態」，「磊磊落落，無一點私情」，李蕙仙仍舊是梁太太，沒有損失，應該要感到滿足了，否則就太對不起何蕙珍的犧牲。

## 2. 李蕙仙應該和我一起保護何蕙珍的名譽

梁啓超向妻子坦承真的愛上何蕙珍，精神上真的有出軌，妻子是該事件的最大的受害者，應該最希望聽到的是丈夫發自內心真誠的道歉與保證（不管有沒有用），但梁啓超〈與蕙仙書〉從頭到尾都沒有向妻子表示過歉意，反而在信中不斷地憐惜何蕙珍，保護何蕙珍：

而無如揆之天理，酌之人情，按之地位，皆萬萬有所不可也。吾只得憐蕙珍而已。然吾觀蕙珍磊磊落落，無一點私情我知彼之心地，必甚潔淨安泰，必不如吾之可笑可惱。故吾亦不憐之，惟有敬愛之而已。<sup>25</sup>

近亦月餘不見此人，因前事頗為外人所傳聞，有一問者，吾必力言並無其影響，蓋恐一播揚，使蕙珍難為情也。因此之故，更避嫌疑，不敢與相見。

<sup>24</sup> 《梁譜》，頁 136-137。

<sup>25</sup> 《梁譜》，頁 136。



今將行矣，欲再圖一席敘話，不知能否也。<sup>26</sup>

梁啟超的意思是人家這麼看得起你丈夫，身為妻子的你應該與有榮焉，而且何蕙珍還是位高格調可敬的對手，雖敗猶榮，如果妻子還不知足，偏要計較清楚的話，只是更突顯妻子的庸俗，襯托出何蕙珍的高貴與聖潔。何況何蕙珍已經是我的乾妹妹了，也就是你的小姑，大嫂怎能跟小姑認真算帳呢？經由梁啟超這樣一節制，李蕙仙大概也只能啞巴吃黃蓮，有苦說不出了。

### 三、婚外情部份情節的出入

梁啟超 28 歲的婚外情大概的輪廓是梁啟超於 1899 年年底至 1900 年 6 月 30 日期間，約有 6 個月的時間，梁在夏威夷檀香山宣傳保皇黨工作時，與當地華僑之女同時也是梁的英文翻譯何蕙珍小姐互有好感，產生愛意，最終以分手結束的一段情感。

該段情有 3 份文獻以資證明，第 1 份是 1900 年梁啟超寫給妻子李蕙仙的前後兩封家書（5 月 24 日、6 月 30 日），也就是本文的主要討論對象，第 2 份是 1900 年 10 月 1 日《清議報》「詩文辭隨錄」專欄梁啟超的〈紀事〉24 首七言絕句詩，第 3 份是 1936 年 2 月 20 日馮自由(1882-1958)《革命逸史》之〈梁任公之情史〉一文。前兩份文獻算是第一手資料，皆出自梁啟超之筆，後人多賴以得知婚外情的經過，讚賞梁啟超的情操。第 3 份文獻屬於第 2 手資料，馮自由比梁啟超小 9 歲，是革命黨資深媒體人，「戊戌政變」至 1900 年前後，維新與革命兩派人士曾經試著合作過，所以馮自由《革命逸史》也記錄梁啟超涉及革命活動的事件，會出現梁啟超婚外情的文章也就不那麼奇怪。此書開頭便聲明：

本書所載史料，除就著者記憶力所及分別錄出外，其於概以香港《中國日報》及著者歷年筆記函牘，民元臨時稽勛局調查表冊為底本，惟掛一漏萬，仍恐不免，海內外諸老友如能列舉所知，匡其不逮，至所歡迎。……本書所載均屬最有根據及最有價值之正史材料，以民國至今尚缺乏清季革命時

<sup>26</sup> 《梁譜》，頁 137。

代的正史之公佈，故暫以《革命逸史》名之。<sup>27</sup>

但畢竟馮自由與梁啟超的政治立場不同，參考馮書資料必須特別謹慎，因為馮自由保證《革命逸史》沒有造假，敢接受社會檢驗，自然有一定的可信度，故暫時姑且信之。

梁版與馮版相同之處是何蕙珍對梁啟超本有好感，多方相助，非梁不嫁，若不能如願，何蕙珍寧願一輩子不嫁，而梁啟超也承認真的愛上何蕙珍。梁版與馮版出入的地方很瑣碎，整理成表比較清楚：

	梁啟超的版本	馮自由的版本
關於李蕙仙的部份	美滿姻緣，百年恩愛	帶不出場，懼內一族
	稟報父親後若可以就納妾	排斥與妾同住
關於何蕙珍的部份	何倒追梁	眾人起鬨
	何主動求婚	梁想求婚
	何願意當妾，任梁安排	何絕不當妾，要在一起的話， 梁需離婚

根據上表，可以看到有兩個地方的出入具有關鍵性：

### （一）誰先向誰求婚？

根據梁啟超〈與蕙仙書〉第一封內容來判斷，是何蕙珍託朋友上門求親，梁啟超原先並沒有娶她的意思：

余（梁啟超）曰：「君戲我，安有不相識之西人閨秀而肯與余結婚？且余有婦，君豈未知之乎！」友人曰：「某何人，敢與先生作戲言？先生所言，某悉知之，某今但問先生，譬如有此閨秀，先生何以待之？」余熟思片時，乃大悟。<sup>28</sup>

梁啟超寫給妻子的版本是說朋友來替何蕙珍說媒，梁以自己是有婦之夫等諸多因素回絕。關於這點，馮自由《革命逸史》之〈梁任公之情史〉的版本卻是梁啟超主動跟何蕙珍求婚，反被何蕙珍拒絕：

<sup>27</sup> 馮自由，《革命逸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1），「本書大意」第4、6條。

<sup>28</sup> 《梁譜》，頁135。

啟超賞其（何蕙珍）才識，大為傾倒，頗露乞婚之意。何女知使君（梁啟超）有婦，遂以文明國律不許重婚一語卻之。啟超居檀半載，知女性剛烈，不可強求，乃為情詩二十絕以解嘲。<sup>29</sup>

馮自由的版本說何蕙珍堅決不當小妾，言下之意，兩人若要在一起，除非梁啟超跟李蕙仙離婚，然後再與何蕙珍結婚，始有可能。

## （二）何蕙珍到底願不願當小妾？

如上述，按照馮自由的版本是不願意，除非梁啟超恢復單身，不然就終身不嫁，「及啟超返日，以麥孟華中年喪偶，擬媒介蕙珍於麥，徵其同意。麥表示嘉納，而蕙珍以向守獨身主義一語相拒，事遂無成」。但若按照梁啟超 1900 年 6 月 30 日〈與蕙仙書〉的版本是何蕙珍願意當小妾，且不管是第幾房都沒關係，只要能跟梁啟超在一起：

吾既已一言決絕，且以妹視之，他日若有所成，復歸故鄉，必迎之家中，擇才子相當者為之執柯，（吾因無違背公理，侵犯女權之理。若如蕙珍者豈可屈以妾婦。但度其來意，無論如何席位皆願就也。惟任公何人，肯辱沒此不可多得之人才耶？）設一女學校，使之盡其所長，是即所以報此人也。<sup>30</sup>

梁啟超跟李蕙仙說何蕙珍願意當小妾，但我梁啟超不能委屈何蕙珍，一定要讓她嫁個相當的才子，例如麥孟華一類的人才，「余忽又有所感觸，乃又謂之曰：『吾欲替此人執柯可乎？』蓋余忽念及麥孺博也」。讓她發光發熱，才能報答何蕙珍的厚愛。

這兩個出入的疑點，很難判斷出誰真誰假，如果梁版是真的，何蕙珍主動求婚也願意當小妾，不計一切的想和梁啟超在一起，梁啟超也不覺得這樣會委屈何蕙珍的話，那事情應該就會變得比較單純，梁啟超只需要說服李蕙仙接受何蕙珍進門即可，短時間內李蕙仙也許不願意，長久耗下去，可能會首肯，結

<sup>29</sup> 馮自由，《革命逸史》，頁 118。

<sup>30</sup> 《梁譜》，頁 137。

局就會皆大歡喜。如果馮版是真的，梁啓超很想娶何蕙珍，但必須離婚才有可能，那事情就會變得很複雜而困難，李蕙仙沒有對不起梁家的地方，沒有理由要她離婚，梁啓超當然更不能主動提離婚，沒有愛情的婚姻在中國比比皆是，梁若執意要離婚可能會摧毀維新派的形象，造成社會不安。那只剩兩條路可走，一是乖乖回到妻子身邊，徹底揮別婚外情，不然就是讓李蕙仙自願退出，成全梁何，事情才真正算落幕。

#### 四、李蕙仙回信的片段與後續發展

目前尚未看到 1900 年 6 月 12 日李蕙仙收信後的回覆內容的完整版，但從第二封〈與蕙仙書〉信中，可推測李蕙仙回信時所寫的部分內容，大約以下 3 點：

一、李蕙仙打算將此事告訴公公梁寶瑛（號蓮澗）讓他作主，引起梁啓超的不滿，梁明確表示不准李蕙仙這樣做，原文寫道：「得六月十二日復書，爲之大驚，此事安可以稟堂上？卿必累我捱罵矣；即不捱罵，亦累老人生氣。若未寄稟，請以後勿再提及可也」。

二、李蕙仙說既然已經決定分手，就不必再想何蕙珍，保重身體要緊，梁啓超覺得李蕙仙對他不夠放心，兩人默契不足，原文寫道：「卿來信所矚，謂此事若作罷論，請即放過一邊，勿常常記念，以保養身子云云。此卻是卿過慮之處」。

三、李蕙仙說男人不必像女人一樣從一而終，梁大可以納妾，也是解決之道，但梁啓超以男女平等來反駁李蕙仙，兩人沒有交集，原文寫道：「卿來書所論，君非女子不能說從一而終云云，此實無理。吾輩向來倡男女平權之論，不應作此語」。

顯然這三點代表李蕙仙的意見和想法，沒有獲得梁啓超的肯定和認同，梁啓超與妻子在愛情和思想的認知上有落差，梁啓超既不要父親出面解決，因父親一定是站在李蕙仙這一邊的，梁也不要納妾，因為做偏房實在太委屈何蕙珍了，梁說「若如蕙珍者，豈可屈以妾婦」？那他到底想要怎樣，真的甘心就這樣回到妻子身邊，把何蕙珍永遠埋藏在心底嗎？應該沒這麼簡單。

梁啓超〈與蕙仙書〉中明明跟妻子說沒空談兒女私情，但信中卻又自相矛

盾起來：

曾記昔與卿偶談及，卿問別後相思否？吾答以非不欲相思，但可惜無此暇日耳，於卿且然，何況蕙珍？在昔且然，何況今日？惟每接見西人，翻譯者或不能達意，則深自憤恨，輒憶此人（何蕙珍）不置耳。近亦月餘不見此人，因前事頗為外人所傳聞，有一問者，吾必力言並無其影響，蓋恐一播揚，使蕙珍難為情也。因此之故，更避嫌疑，不敢與相見。今將行矣，欲再圖一席敘話，不知能否也。<sup>31</sup>

梁啟超不是才說忙到連想妻子的時間都沒有了，卻又表明懷念與何蕙珍共事的美好時光，還期待與何蕙珍再次相見，顯然忘不了何蕙珍，這不正好是妻子所擔心之事，就是梁啟超雖然表面上已經與何蕙珍分手，但藕斷絲連，後患無窮，可見妻子對於梁啟超的情感自制力是沒有信心的，她應該不相信梁啟超真的願意徹底放棄何蕙珍。

果不其然，事隔三個月，1900年10月1日《清議報》「詩文辭隨錄」專欄，梁啟超公開刊登以何蕙珍為主角的情詩，〈紀事〉24首七言絕句，其中比較露骨的詩作有：

頗媿年來負盛名，天涯到處有逢迎。識荆說項尋常事，第一相知總讓卿。  
（其二）

眼中既已無男子，獨有青睞到小生。如此深恩安可負，當筵我幾欲卿卿。  
（其六）

憐余結習銷難盡，絮影禪心不自由。昨夜夢中禮天女，散花來去著心頭。  
（其十五）

卻服權奇女丈夫，道心潭粹與人殊。波瀾起落無痕迹，似此奇情古所無。  
（其十六）

匆匆羽檄引歸船，臨別更慳一握緣。今生知否能重見，一撫遺塵一惘然。  
（其二十一）

曩譯佳人奇遇成，每生游想涉空冥。從今不羨柴東海，枉被多情惹薄情。

<sup>31</sup> 《梁譜》，頁137。

（其二十二）

鸞飄鳳泊總無家，慚愧西風兩鬢華。萬里海槎一知己，應無遺恨到天涯。

（其二十三）<sup>32</sup>

梁啟超公開說何蕙珍是與我最貼心的人，「第一相知總讓卿」，我應該要把握住她，「如此深恩安可負」，可是我沒有，分手後我並不開朗，「絮影禪心不自由」，還是會觸景傷情，「一撫遺塵一惘然」，但她卻有辦法回復平靜，「波瀾起落無痕迹」，真是奇女子，「道心潭粹與人殊」，好想再見她，「今生知否能重見」，只能靠自己幻想，「每生游想涉空冥」，真是情到濃時情轉薄，「枉被多情惹薄情」，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萬里海槎一知己，應無遺恨到天涯。」梁啟超與何蕙珍雖說已經分手，但對何蕙珍的愛意並沒有降溫，其倩影昇華為完美的女神的形象。

〈與蕙仙書〉是家書，起初也只有特定人士才看得到，對李蕙仙的隱私權具有一定的保護作用，〈紀事〉詩一旦發表於《清議報》後，就變成可供閱報人談論的話題，這對李蕙仙將造成二度傷害，內容若太露骨，還可能是重創。事情發展至此，證明該事件還未落幕，這是否意味著梁啟超在期待另一種解決之道，但礙於妻子的顏面問題，梁啟超在〈與蕙仙書〉信中不敢挑明說出來，現在藉著媒體和輿論的力量，迫使妻子產生自覺，退出這場三個人的戰爭中。

在捍衛婚姻方面，李蕙仙佔有絕對優勢，但在愛情戰場上，李蕙仙註定要輸，因為梁李的結合沒有感情基礎，只靠權利義務在維繫，而且梁李兩人的相處也許不如自己所說或外界所想那樣美滿恩愛，馮自由《革命逸史》說：

李女貌醜而嗜嚼檳榔，啟超翩翩少年，風流自賞，對之頗懷缺憾，然視婦兄為仕途津梁，遂亦安之。……啟超素有季常之癖，……蓋來喜得孕，極為女主所不喜，故不得不遣至別處分娩。久之，梁婦怒解，使許來喜母子歸橫濱同居。<sup>33</sup>

意思是梁啟超因為想要少奮鬥二十年，才娶貌醜不雅的李蕙仙，因為李家有權

<sup>32</sup> 梁啟超，《清議報》（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第8冊，頁4163-4164。

<sup>33</sup> 馮自由，《革命逸史》，頁119-120。

有勢，不能得罪，所以梁啓超成了「懼內」一族，李蕙仙才是梁家的主人。另外，梁啓超在李蕙仙去世後曾透露夫妻倆打過架，導致乳腺癌：

順兒呵！我總覺得你媽媽這個怪病，是我們打那一回架打出來的，我實在哀痛之極，悔恨之極，我怕傷你們的心，始終不忍說，現在忍不住了，說出來也像把自己罪過減輕一點。<sup>34</sup>

從醫學的角度來看，不可能因為打架而罹患癌症，但知道梁李的相處存在著某些不足為外人道的苦衷，並不盡然像梁啓超〈與蕙仙書〉所說的「美滿姻緣，百年恩愛」。

而前面說梁啓超可能在期待另一種解決之道，排除掉納妾，維持現況等兩種可能外，只剩下一種可能就是離婚，但不能是我梁啓超主動提出，因為妻子並沒有對不起我，必須讓妻子主動提出才行，也就是李蕙仙既然得不到丈夫的心，還不如知難而退，主動願意離婚，成全相愛的兩個人，得到我們的感激，這才是我梁啓超最想要最期待的結局，也才是梁啓超〈與蕙仙書〉操作如此隱諱的書寫策略的真正目的所在。梁啓超在現實生活中怕妻子，不敢得罪李家，但在文字領域中，梁啓超才是主宰，他握有發聲權和節制權，可以在其中運作一己之慾念，妻子的威勢在文字領域中發揮不出來，只能看在眼裡，模稜兩可，不管自己的意圖有沒有真的實現，透過書寫策略的操作，至少補償結婚 8 年多來自己的精神損失，這也不失為一種自我救贖之道。

而李蕙仙出身名門望族，應不希望離婚收場，二女侍一夫也許勉強可以接受，但最好也不要發生，「雖自今以後，學大禹之八年在外，三過其門而不入，卿亦必能諒我。若有新人雙雙偕遊各國，恐卿雖賢達，亦不能無小芥蒂也」。加上梁啓超又不願意委屈何蕙珍當妾，挑明何蕙珍的美好是無可取代的，李蕙仙為了捍衛自己的婚姻，必須設法鞏固自己的地位，讓自己沒有任何可供挑剔之處，才有可能在未來的日子中將何蕙珍的魅影，徹底從我的婚姻中驅逐出境，才不會同床異夢，後患無窮。所以，李蕙仙用中國傳統觀念檢視自己的不足之處，發現還有一處必須加強，就是傳宗接代，李蕙仙在 1900 年前只生下一女梁思順，沒有替梁家生到兒子，這對中國家庭來說是一大致命傷，後來

---

<sup>34</sup> 《梁譜》，頁 685。

1901 年 4 月才在東京產下梁思成，但梁思成身子相當薄弱，令人擔憂，李蕙仙在梁啓超發生婚外情時，不那樣贊成梁啓超納妾，但現在爲了傳宗接代的問題，李恐怕要從長計議了，對此，張朋園〈梁啓超的兩性觀：論傳統對知識份子的約束〉主張「李蕙仙爲丈夫納妾的意念，可能起於梁啓超的『夏威夷之戀』」的看法<sup>35</sup>。由於李蕙仙一心只想鞏固自己的地位，所以讓自己的丫鬟王桂荃幫忙生小孩，這個人選最能信任，最沒有威脅性，這樣做才能做好婚姻風險控管，保衛婚姻。

## 結 論

感情的世界很難說誰對誰錯，本文也沒有資格判決梁啓超的感情世界，但至少要設法還原完整面貌。經由以上分析與解碼，本文得到以下幾點看法：

一、在符號「能指」的部份，梁啓超〈與蕙仙書〉持續爲維新運動的理想做服務，替「一夫一妻制」建立典範，試圖改變中國男人妻妾成群的舊習慣。

二、在符號「所指」的部份，應有兩種可能性：

（一）從消極面來看，就梁李的相處模式而言，梁啓超懼內，李蕙仙強勢，一般日常生活實務由較爲強勢的李蕙仙主宰，梁啓超較難有主導權，心中自然會不平衡，但若是在文學書寫的領域中，李蕙仙沒有梁啓超的好文筆，梁啓超的優勢便釋放出來，書寫可視爲梁啓超握有掌控權力的一項利器。透過書寫策略的操作，「符號」編碼的程序，小心翼翼的經營〈與蕙仙書〉的言外之意或深層意義，至少補償結婚 8 年多來自己的精神損失，這也不失爲一種自我救贖之道。

（二）從積極面來看，梁啓超不願真的放棄何蕙珍，若真要在一起，似乎只能與元配離婚，但爲了顧及個人形象與李蕙仙的面子，「離婚」兩個字絕不能由梁啓超主動開口，透過〈與蕙仙書〉書寫策略的操作，讓李蕙仙知難而退，主動提出離婚，如此一來，大家都有臺階下。

<sup>35</sup> 張朋園，〈梁啓超的兩性觀：論傳統對知識份子的約束〉，《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 2 期，1994.06.，頁 55。



簡言之，梁啟超〈與蕙仙書〉的符號學意義，正是讓自己在「知識男性唱和的園地」裡的「扮相」，能夠一直立於不敗之地。即使有超出「扮相」的演出，也要精心策劃一場高水準的文學展演，來符合自己的「扮相」該有的應對方式，也使自己壓抑已久的心聲得到解放。

### 參考書目

- 丁文江 《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臺北：世界書局，1962）
- 江勇振 〈男性與自我的扮相：胡適的愛情、軀體與隱私觀〉；收於熊秉真主編，《欲掩彌彰：中國歷史文化中的「私」與「情」——公義篇》（臺北：漢學研究中心，2003）
- 李又寧、張玉法編 《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臺北：傳記文學社，1975）
- 李威熊編 《大學國文精選》（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7）
- 周慶華 《中國符號學》（臺北，揚智文化事業公司，2000）
- 胡 纓 〈歷史書寫與新女性形象的初立：從梁啟超〈記江西康女士〉一文談起〉，刊《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第9期，2001.08.
- 梁啟超 《清議報》（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
- 馮自由 《革命逸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1）
- 張朋園 〈梁啟超的兩性觀：論傳統對知識份子的約束〉，刊《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2期，1994.06.
- （美）羅伯特·司格勒斯(Robert Scholes)著，譚大立、龔見明譯 《符號學與文學》(SEMIOTICS AND INTERPRETATION)（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88）

## **The handling of writing tactics in *The Letter To Hui-Xian* by Liang Qichao**

**Hui-Ling Wang**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Tung Hai University

### **Abstract**

In 1900, Liang Qichao went to Honolulu to propagate royalism thought. He and the daughter of oversea Chinese Hui-Zhen He had extramarital affair, but parting finally. Liang Qichao wrote two family letters to his first wife (Hui-Xian Lee) at that time for explaining the extramarital affair. According to the statement of *The Letter To Hui-Xian*, he want to admit overstepping the limit spiritually himself while writing the family letter and say good-bye to this section of extramarital affairs to practise the ideal of the monogamy. This statement earns the historical favorable comment for him. But in the undertone of celestial book and the follow-up development of extramarital affair, *The Letter To Hui-Xian* obviously hide his personal power and desire behind the characters. This article will regard as one sign passing the code from the viewpoint of literature Semiology. Divided the code into signifier and signified for attempting to decode the code. In signifier, *The Letter To Hui-Xian* serve for the ideal of *The Reform Movement*, setting up the model for the monogamy. In signified, its passive meaning is to compensate the emotional distress in marriage life and being the own way of redemption. Its positive meaning Liang Qichao could be together forever with Hui, by prompting John to retreat in the face of difficulties. The Semiology of meaning in *The Letter To Hui-Xian* lie in taking as perfection annotation in performativity of masculine literary.

**Keyword: Liang Qichao, *The Letter To Hui-Xian*, writing tactics, Semiology, performativity**